

# “二千年高文”的不断新生

胡琦

在近现代中国，“文章”传承之中有西、日之间多元的互动。即使是最须体现自家特色的“国文”，在观念的层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

1942年，钱穆先生在一篇讲演稿的开端，即对中国文字之“绵历”感慨系之。他列举“关关雎鸠”为“三千年前之诗歌”，“王朝至于南郊牧野”为“三千年前之史记”，“学而时习之”为“二千五百年前一圣人言”，降及《庄子》《孟子》《老子》之文，莫不为二千年前哲人之著作、对话、格言，对现代之国人而言，却亦并不遥远：

即在二千年后之今日，翻閱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语法同，明白如话，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国人习熟而不察，恬不以怪。试游埃及、巴比伦，寻问其上土著，于彼皇古所创画式表音文字，犹有能认识使用者否？不仅如此，即古希腊文、拉丁文，今日欧洲人士能识能读者又几？就不仅于此，即在十四五世纪，彼中以文学大名传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学，非翻字典亦不能晓也。

钱先生铺叙古典，比照异邦，反反复复致意，强调的正是中国文学对本民族文化绵延、熔铸之大用。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学解组，儒门淡薄，而“古文”的流风余韵却仍未全然衰息。先秦古籍对今天的国人仍然“明白如话”，显然不全“与生俱来”或者“不证自明”的。古文的“栩栩如生”、“琅琅上口”，事实上正离不开语文教育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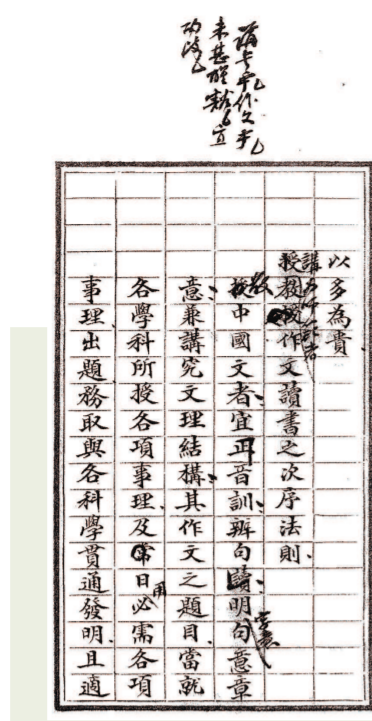
传统“古文”如何在晚清新旧变局之后继续传承并融入新的教育、文化体制？现代意义上的“国文”学科体系如何形成？近现代“新知”的传播如何与语体、文体的变革互为推挽？近年来，文学史、教育史、思想史、制度史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相关议题作出了探索，而陆胤新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乃是一部以文学研究为核心，以教育制度和阅读史为背景，深入体贴历史血脉和观念肌理的力作。

## “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广阔光谱

《国文的创生》考察清季新式文学教育的发展，聚焦的时段是从清末“新政十年”向前延伸到甲午战争，也即从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这十七年间。据作者考证，现代意义上的“国文”一词始自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186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出了文字、文体、文学传统等多层次的内涵。光绪末年（1890年代）传入中国知识界，从专指日文演化而泛指某一国家本国文字与文学的概念；后被官方确认，用于指称“中国文字学”。在这一时期，“国文”指向经史词章，成为旧学、国粹的象征，与趋新的“国语”形成对峙，就不是难于索解的事了。

在观念层面上，“国文”与“国语”类似，都具有现代与全球视野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潜在内涵。但在清季中国人的史记理解和教育实践中，“国文”无疑又与中国固有的“古文”传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最直接的一层现实因素，便是晚清各级学堂中担当国文课程的，多是科举出身的“中学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清末民初中等、高等学堂的“国文”读本，常常就是古文选本。如程先甲《高等国文学教科书》、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等等，皆为其例。在初等启蒙教育中，“文言”也大有用武之地。光绪三年（1877），传教士狄考文（C.W. Mateer）有鉴于中国文人不便初学理解的缺点，曾建议华北地区的教科书宜用官话（mandarin）编写。不过，清季中国人所编教科书，或安排了“文话”“白话”并置的体例（《蒙学报》，1897—1898），或采用了“浅近文言”这种折中语体（《蒙学读本全书》，1902）；“文言”作为正式语体、知识媒介的属性颇为稳固。

从古迄今，“古文”“古语”“文言文”“古代汉语”这些相似而相异的概念，背后各有其学术背景和观念谱系，或意在“句读不群”背后的“古道”，或强调各体“辞章”内在的审美属性，或为和口语白话对立的语体概念，或系针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言学术语。考察“文、白”问题，无疑需要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深入互



1905—1908年前后福建兴化府官办中学堂的读书场景。Harrison Sackett Elliott (1882—1951)摄影

癸卯学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第三次稿本中关于“中国文”一种教法的规定和批改。

动。陆著指出，文、白书写内部皆有复杂层次，二者之间亦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将“文言”与“白话”对峙起来的看法很可能要相当晚近才产生。在前人从文学史（如夏晓虹、王凤等）、翻译史（如郑海娟）等角度对“文白”问题所作研究的基础上，陆著侧重从教育史的视野，发掘“读本”文献实例（如“华盛顿听樱桃树”和“说猫”等浅近文言课文）。

“五四”以后，不但传统的私塾教育仍有延续，在新式学校中也不乏对“文言文”的提倡。如罗常培自述其1920年代在平津地区教授中国国文的经历，提到当时中学教师多以《古文观止》为教材，南开中学有两位老先生以讲授《陈情表》《出师表》为拿手好戏，不幸获赠“臣密言”和“臣亮言”的雅号。虽然罗氏意在批评旧教法，但也颇能窥见当时一般情形。舒芜曾回忆1934年左右，桐城中学的初中国文老师殷善夫“只讲文言文，作文也只出文言文的题目”；而另一位吴步尹先生，则喜讲授周氏兄弟的新文学作品。可见在地域传播的影响外，教师个人的因素在教育“现场”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又如抗战之初（1938），林徽因通过抑扬顿挫的“边读边表演”，为子女讲授《唐雎不辱使命》。虽系国难期间别有怀抱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传递，但同样显示出家庭教育中“古文”传统的韧性。民初以后“国文”教育的情形，固不在陆著研究范围之中；但本书所揭示的问题却颇具普遍性。教育实践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化，学习阶段的分工，教师出身、知识背景和文化立场的影响，以及方言多歧之下，“文言”或“古文”反而可以成为塑造跨地域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工具，凡此种种，都能为后续时段的研究提供灵感。

## 教育史视角下的“古文”与“国文”

相对于经济史、制度史等学科，文学史、观念史的研究往往需要以想象力和主观判断建构概念、思想、文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借助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让更多较为抽象的问题落到实处。围绕诗歌、尺牍、诵读几个问题，《国文的创生》深入历史现场，触摸了大量的“实况”与“细节”，叩响隐藏在细节中的回声。例如尺牍一类，本属应酬文体，但在教育制度改革以后，却因其在日常实践中的坚韧惯性得以存留，并因应科学精神、国族主义、女性意识等新理念演化调整。称谓、款式、套语等程式或会与时代俱变，但“虚文”中蕴藏的身份意识、情感内涵，却是亘古如一。

## 近世汉字文化圈内部知识的流转

除了“古”与“今”之间的容履消长，在近现代中国，“文章”传承之中更有中、西、日之间多元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即是最须体现自家特色的“国文”，在观念的层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影响关系。

《国文的创生》结合多语种、多国别的史料，尤其深入发掘了作为东西“中介”的日本史料，对近代中西知识网络的错综交织亦有充分而深刻的揭示。例如，来裕恂的《汉文典》（1906），就多受惠于儿岛献吉郎的《汉文典》《续汉文典》等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904年讲授）也暗用了儿岛的“文品”术语框架。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所谓“逆输入”的现象。如龙志泽《文字发凡》第三章《段落》以“起”“承”“辅”“叙”“过”“结”六法论文章“体段”，其说源自陈泽曾《文筌》。然观其具体表述，如“起，文之起笔，如人之面眉眉目”，以明白为贵，与其说是对《文筌》“起，贵明切，如人之有眉目”的重述，毋宁说是从日本汉学者著作《文法独案内》（1888）中内容的互译。

《文法独案内》的材源多出于中国宋元以降的文章学著作，不过这些书籍因其通俗性质不为明清人所重，甚至在中国传本稀少。《文筌》在元代有与《策学统宗》合刊之麻沙本；明初则有改题《文章政治》之宁藩刊本；有清一代，目前所知有李士燾家抄本，曾否重刻，文献无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体例繁碎”“殊无情理”。不难想见其影响之有限。陆著提出“逆输入”的概念解释此类现象，认为清末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国学”资源也需经过日本汉学者的汇集加工，方才重新被“激活”，不能不说是近世东亚书籍和思想传播中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近世汉字文化圈内部知识的流转，存在复杂的层叠，特别需要研究者细心

梳理考辨。例如王葆心《高等国文讲义》（1906）中“情、事、理”三分之说，陆著除了勾稽西洋、日本来源，追溯其受西洋哲学和日本修辞学著述之启迪，又交代了叶燮、恽敬、吴德旋等清人的类似论点，并说明“三家之论均未得到王葆心的征引”。有趣的是，到了王氏十年后的改订本《古文辞源义》（1916）中，大量增入了中国本土文献作为佐证。其中恰好就有恽敬《与勿之论文书》中关于言理之辞如火、言情之辞如水、言事之辞如土的论述。但此次新增文献中真正涉及“述情”的，也仅有恽敬一家。王葆心在《通义》大举增补传统文章学资源时，仍未彻底梳理出“述情”立类的本土渊源，这反过来恰恰可以为“情、事、理”框架的外来属性提供旁证。

## 教育史视角下的“古文”与“国文”

相对于经济史、制度史等学科，文学史、观念史的研究往往需要以想象力和主观判断建构概念、思想、文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借助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让更多较为抽象的问题落到实处。围绕诗歌、尺牍、诵读几个问题，《国文的创生》深入历史现场，触摸了大量的“实况”与“细节”，叩响隐藏在细节中的回声。例如尺牍一类，本属应酬文体，但在教育制度改革以后，却因其在日常实践中的坚韧惯性得以存留，并因应科学精神、国族主义、女性意识等新理念演化调整。称谓、款式、套语等程式或会与时代俱变，但“虚文”中蕴藏的身份意识、情感内涵，却是亘古如一。

## 近世汉字文化圈内部知识的流转

除了“古”与“今”之间的容履消长，在近现代中国，“文章”传承之中更有中、西、日之间多元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即是最须体现自家特色的“国文”，在观念的层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影响关系。

《国文的创生》结合多语种、多国别的史料，尤其深入发掘了作为东西“中介”的日本史料，对近代中西知识网络的错综交织亦有充分而深刻的揭示。例如，来裕恂的《汉文典》（1906），就多受惠于儿岛献吉郎的《汉文典》《续汉文典》等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904年讲授）也暗用了儿岛的“文品”术语框架。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所谓“逆输入”的现象。如龙志泽《文字发凡》第三章《段落》以“起”“承”“辅”“叙”“过”“结”六法论文章“体段”，其说源自陈泽曾《文筌》。然观其具体表述，如“起，文之起笔，如人之面眉眉目”，以明白为贵，与其说是对《文筌》“起，贵明切，如人之有眉目”的重述，毋宁说是从日本汉学者著作《文法独案内》（1888）中内容的互译。

《文法独案内》的材源多出于中国宋元以降的文章学著作，不过这些书籍因其通俗性质不为明清人所重，甚至在中国传本稀少。《文筌》在元代有与《策学统宗》合刊之麻沙本；明初则有改题《文章政治》之宁藩刊本；有清一代，目前所知有李士燾家抄本，曾否重刻，文献无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体例繁碎”“殊无情理”。不难想见其影响之有限。陆著提出“逆输入”的概念解释此类现象，认为清末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国学”资源也需经过日本汉学者的汇集加工，方才重新被“激活”，不能不说是近世东亚书籍和思想传播中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近世汉字文化圈内部知识的流转，存在复杂的层叠，特别需要研究者细心

四年方才开始作“说理文”，而在此前的《轱辘语》（1875）中，张氏主张“欲学作时文，先学作论”。不同教育考试制度之下的不同选择，正可形成鲜明对照。

事实上，无论是“古文”还是“国文”，将当下的读者与古人的思想、历史、性情德性联系起来，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汝纶尝谓“《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将“古文”视为经学意识形态崩解之后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寄托，推崇不可谓不高。而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古文”还具体构成了古典文化修养传承的媒介。一代代人的诵习、使用，使得“二千年高文”处在不断“新生”的过程中。陆著除了阐发了“古文”背后经史国粹之意涵，也指出了其“创新”的一面，例如浅近文言在蒙学教科书中承担了传递格致知识的功能；源自古文、时文程式的“文法”之学，同样可以成为传播新知的利器。

《国文的创生》书首衬页的正反面，分别是《湖北官报》所载《督部堂张建设存古学堂札》（1905）和癸卯学制稿本《初级师范学堂章程》（1903）之影影。选用这两份与张之洞关系甚深的文件，一方面或许是对作者治学之途“却顾所来径”，另一方面也于“国文”之厚重内涵，三致意焉。存古学堂札一图中，还特意用白色凸显了以下文字：

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湮灭。张之洞的定义，正道出了“国文”与“古文”之间的血肉关联。及至今日，即在现代汉语之中，“存而传之”、不可断灭者，亦昭昭在焉。借用陆胤新思“自铸”的术语，国文的“创生”，既是观念、文体和思想的一次次“刷新”，更有价值、语言与情感的深刻“脉延”。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第530期

## 黄裳与《舞台生活四十年》

沈鸿鑫

黄裳先生是海上名编，也是一位学养丰赡的作家和戏曲评论家，出版过《旧戏新谈》等著作。他有一桩特别大的功劳，那就是参与策划、编辑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戏曲艺术家的传记作品，开了艺术家传记文学的先河。

长篇连载梅兰芳艺术生涯回忆文章的想法，最初是《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柯灵先生提议的。编辑黄裳作为戏曲评论家，懂得戏曲艺术家传记的价值，经副社长兼总经理严宝礼推荐，担任起了这项工作具体实施的任务。后来黄裳说，他是“奉命行事”。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好几位朋友向梅兰芳提起，是否写一部回忆性质的书。当时因梅兰芳工作的重点放在编戏和演出上，且自党艺术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抗战时期也曾再次动念，但离乱期间没有提笔的兴致。1942年，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上海，朋友们又旧事重提，他觉得自己去过的经历有不少已逐渐淡忘，当年朝夕相处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散居南

北，一部分材料又时时有散失的可能，因此感到这部书倒很有编写的必要了。

1949年8月，梅兰芳刚从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回到上海，黄裳就到梅兰芳的寓所拜访，诚恳地约请梅先生写一部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纸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梅先生当然是高兴的，但又有些犹豫。黄裳对梅先生说：“现在你的工作忙，以后恐怕更忙，如果现在不趁着写出来，将来就更难着手了。”梅兰芳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他向黄裳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黄裳知道要促成此事，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是个关键人物，必须先做通他的工作。那时梅葆玖正率团在苏州演出，黄裳专程赶到苏州与许姬传长谈。许姬传表示自己还未写过长篇连载文字，怕是一旦担不了。黄裳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源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

多方居间促成之下（《文汇报》方面包括柯灵、严宝礼以及时任社长兼总编

我们为什么会追求个人的成就？成为大人物真的符合我们的个人利益吗？或许有人会说，他们追求成功并不是为了名利，只是因为那样的生活比单纯的普通生活更值得过。

青年哲学家乔希·格拉斯哥（Josh Glasgow）认为，“非凡生活”并不比“平凡生活”更有意义，并列举一系列案例说明“成为重要人物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意义”。这篇奇特的论证近日刊登在《美国哲学学会杂志》网站（2022年8月）。

《平凡而有意义的生活》一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的哲学研究，作者指出，在对个人幸福的探讨中，并没有追究过“热望成为重要人物”这一点，这种本能的热情被哲学家们忽略了，但他们一直在讨论荣誉、成就、道德等相关议题。

人们大都默认，重要与意义这二者是挂钩的：做重要的事情，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产生可观的影响，创造长久的价值，会让你个人生活意义大增。这种有影响、有目的的生活所创造的额外价值，普通生活给不了。而格拉斯哥要证明的是，不仅仅像日本哲学家森冈正博说的那样，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一个微小事件，很可能就会耗尽或推翻那项重要成就的意义——他认为重要性对于意义来说不仅非必要，且完全不相关；这两者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

格拉斯哥区分了有价值、有意义和重要性，并从主观认定与客观标准来组合这几个元素。像织毛衣、踢足球、烤面包，这些事情都挺有价值，我们能从中获得成就感，但并不重要——那种能令佛祖释迦牟尼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性。重要是至少值得人们关注。

稀有，独一无二，可以令人重要。例如，你是你儿子唯一的母亲，或是本村麻将第一，你在这方面便十分稀有，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你在其他方面都不重要。因此，有多重要取决于你的参照系及相关的评价标准。但仅仅稀有还不够，一如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奈格尔指出的，一个番茄酱的瓶子也是与众不同的。重要的东西必须有相对较高的价值，而重要性是有程度之分的。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

对生命的意义，大体有三种观点，主观主义、客观主义以及二者的混合。主观主义理论说的是，我们认为生活中什么东西有意义，这个东西实际上就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成为大人物会让你生活的意义大增，那么它就确实会令意义大增。

然而，我们也可能判断失误。我们对自己不甚了解：我自以为想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花在非摩托上，但现在我发现，这只是中年危机的症候。人们会被自己的动机误导，这就是主观主义无法解决的困境。

客观主义理论则认为，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意义的东西是有恒定标准的，与我们一己的欲望、喜好等等完全无关。创造、寻求那种客观价值，才能赋予我们自己生活的意义。例如，特蕾莎修女也许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吸引力，即便她觉得很无聊，那项工作也还是有意义的。此外，人人都觉得像特蕾莎修女、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重要人物显然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恰恰是因为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特别重要，所以他们的生活有意义。

不过还有一种危机：你正确认识到了有价值的事项，并加以优先考虑，但这些事项并没有给你带来活力、让你倍感兴奋，或是不再能给你提供动力。大哲也难以避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发现，他的人道主义目标让他无所适从。尽管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工作都非常有价值，但仍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那个目标已经不再有魅力”，他写道，“好像活着也没啥盼头了”。

事实上，抑郁症即通常表现为失去动力去追求、肯定价值，或从中获得满足。这意味着，向一个绝望的人证明乃至让他承认他生命中的客观价值还不够，我们必须尝试让他关心、参与其生命的客观价值，从情感和动机上帮助他走出困境。

混合主义的理论便是将主观认定的价值和客观存在的价值捏合在一起：当我们面对具有客观价值的事项，感到主观上被吸引、并参与其中，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

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获得一些意义。不过这样看起来，我们之所以关心生活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的生活与一些外在价值联系在一起——那些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之外看得到的价值。例如，养育一个孩子，促进正义，创造纪录，创造美，有道德地生活，爱一个人。

那么，在混合主义理论看来，宏伟的外在价值（结束全球饥饿，或实现启蒙）是否可以通过较小的价值来实现呢（给孩子买一个冰淇淋甜筒，或在周末做一些正念冥想）？看上去是等闲不同的。它和客观主义一样，也要解决所谓的“升级”问题：为什么更多的客观价值等于更多的意义？

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尔·列维认为，“最高的、最让人满足的意义”必须是开放结局、永无止境的事项，“其中有价值价值的善”。这样的标准限制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如耕作、生育子女或投身友谊。他认为这些追求确有微小的普通意义，但生活中更大的事情，比如研究哲学、追求正义和创造艺术，才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超级”意义。

我们梦想做重要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极富客观价值。客观价值可以助长主观参与；我们在理性上被吸引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但客观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之所以恰好追求这项事业、处于某段关系，往往是出于其他的偶然因素：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养，我们的物质、社会条件和机会，我们的特异经验，我们的个人生物构成。

格拉斯哥设问，如果我有能力治愈癌症，又能给饿肚子的人做披萨饼，且是唯一能够完成这两项任务的人，但又不能同时完成，我真的会全身心投入到做披萨而不是治疗癌症上去吗？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白大褂，而不是围裙。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观价值判定合一，足以支撑他们走完全程——在实验室不停劳作，撰写项目书，监督科研人员，管理一个小的科层制机构……各种让人操心的苦差事，然后功成名就，同时获得道德上的巨大满足。许多成功人士都会谈论他们的平衡之道，但事实上，巨大的成就往往要求巨大的牺牲——牺牲了参与其他事情的机会。如果你确有相当不同的主观倾向，如延续老年友谊、享受社区服务的快乐，那么即便治愈癌症是更有理由做的事，即便你也多少受到吸引，它也不会给你的生活增添多少意义。

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类似的权衡。我们没有去做那些高尚而重要的事，而是和朋友们一起，看最喜欢的球队比赛，听音乐……我们追求这些关系和活动正是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快乐，更无关道德追求（对密尔来说，能修复生活意义的事情是读诗）。格拉斯哥借用分析工具，论证了从获得意义的层面来说，你无须变得特别重要，平凡生活能赋予你的绝不输于那些“重要”的生活。

## 平凡生活中的意义

编译/黎文

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获得一些意义。不过这样看起来，我们之所以关心生活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的生活与一些外在价值联系在一起——那些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之外看得到的价值。例如，养育一个孩子，促进正义，创造纪录，创造美，有道德地生活，爱一个人。

那么，在混合主义理论看来，宏伟的外在价值（结束全球饥饿，或实现启蒙）是否可以通过较小的价值来实现呢（给孩子买一个冰淇淋甜筒，或在周末做一些正念冥想）？看上去是等闲不同的。它和客观主义一样，也要解决所谓的“升级”问题：为什么更多的客观价值等于更多的意义？

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尔·列维认为，“最高的、最让人满足的意义”必须是开放结局、永无止境的事项，“其中有价值价值的善”。这样的标准限制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如耕作、生育子女或投身友谊。他认为这些追求确有微小的普通意义，但生活中更大的事情，比如研究哲学、追求正义和创造艺术，才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超级”意义。

我们梦想做重要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极富客观价值。客观价值可以助长主观参与；我们在理性上被吸引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但客观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之所以恰好追求这项事业、处于某段关系，往往是出于其他的偶然因素：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养，我们的物质、社会条件和机会，我们的特异经验，我们的个人生物构成。

格拉斯哥设问，如果我有能力治愈癌症，又能给饿肚子的人做披萨饼，且是唯一能够完成这两项任务的人，但又不能同时完成，我真的会全身心投入到做披萨而不是治疗癌症上去吗？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白大褂，而不是围裙。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观价值判定合一，足以支撑他们走完全程——在实验室不停劳作，撰写项目书，监督科研人员，管理一个小的科层制机构……各种让人操心的苦差事，然后功成名就，同时获得道德上的巨大满足。许多成功人士都会谈论他们的平衡之道，但事实上，巨大的成就往往要求巨大的牺牲——牺牲了参与其他事情的机会。如果你确有相当不同的主观倾向，如延续老年友谊、享受社区服务的快乐，那么即便治愈癌症是更有理由做的事，即便你也多少受到吸引，它也不会给你的生活增添多少意义。

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类似的权衡。我们没有去做那些高尚而重要的事，而是和朋友们一起，看最喜欢的球队比赛，听音乐……我们追求这些关系和活动正是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快乐，更无关道德追求（对密尔来说，能修复生活意义的事情是读诗）。格拉斯哥借用分析工具，论证了从获得意义的层面来说，你无须变得特别重要，平凡生活能赋予你的绝不输于那些“重要”的生活。

1950年10月16日，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首篇文章经黄裳编辑，在上海《文汇报》与读者见面。文章刊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和欢迎。《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汇报》一共连载了197期，先后结成二集，第一集梅兰芳述，许姬传、许源来记，1952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第二集梅兰芳述，许姬传、许源来记，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1958年《戏剧报》约稿，连载第三集，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198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7年1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将第一、二、三集合集出版，书名就是《舞台生活四十年》。（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惯，也都感到兴趣了。虽然这一年中间，因为事情太忙，屡次停顿，我们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地重视着这件工作。”1951年7月，梅兰芳移居北京，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此后的写作活动主要在北京进行。

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方法是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并执笔撰稿，稿成后寄给在上海的许源来，由他与梅的几位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文稿交到黄裳手里，由他审校、编辑、发排，写成一篇，编发一集，在报上逐期连载。据柯灵回忆，为使文章能够逐日刊登、不掉链子，他让报馆驻京办事处的谢蔚明协助，对梅兰芳进行采访，搜集资料、拍摄照片等，在上海则让懂戏的行家黄裳与许源来对接，以确保文章能够按时发排。